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四六八）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三五期 ——
（二〇〇八年三月十七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803d）

【史海钩沉】	文革中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运动（上）	胡大年
【研究报告】	上山下乡运动再研究：引起争议的几个问题	潘鸣啸
【解密档案】	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信	白智清

【史海钩沉】

文革中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运动（上）

• 胡大年 •

〔本文摘自胡大年著《爱因斯坦在中国》（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一书中的第五章：“爱因斯坦：从批判中重生的偶像”的原定稿。在中国出版时有所删改——编者〕

文化大革命（1966—1976）对中国来说完全是一场悲剧和灾难。这场主要由毛泽东个人发动的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可能是最具毁灭性的影响。（1）由于文化大革命是以摧毁文化机构开始的，中国的科学和科学家都属于最严重的受害者。文革期间，爱因斯坦和相对论遭到了有组织的批判。该批判运动于1968年首先发难于北京，1970年代又在上海得以扩张和加强。陈伯达和姚文元支持了这种批判，并利用它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在陈、姚这些激进的领导人倒台之后，大多数政治和哲学上的批判都于1976年停止了。但由这些批判所引发的一场关于相对论的大争论，却又持续了6个月。直到1979年，中国政府才正式给爱因斯坦“平反”。本章研究了这场批判运动的起源、内容、参与者和后果。该调查有助于阐明，在那动乱年代里，中国的科学发展是如何受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的影响的。

◇ 北京的批判运动

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鼓噪”发生于1965年末，当时媒体上也重新出现了针对爱因斯坦的批判。此后三年半是文革的“躁狂”期，“在这段时间里，由毛泽东引发的政治危机最深、混乱最严重”（2）。在这种政治极端主义的恶毒气氛中，一些人看到了通过攻击知名的权威及其成就来成名的机会（3）。这种个人自发的攻击，在中国引发了对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有组织的批判。1967年末，湖南醴陵的一名中年数学教师周友华，（4）来到北京宣讲其题为《从物质的矛盾运动研究场的本质及其转化》的论文。该文根据毛泽东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导，批

判了物理学中的场论，尤其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5〕。

1968年2月，周友华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宣读了他的“新理论”，该所的物理学家们当场对这个“革命”的场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尽管物理学家们对周友华在讨论该科学问题时的不科学和不负责任的态度表示了谴责，但当时掌握中科院权力的革委会却认为周友华的文章在政治上是正确的，是应当支持的“新生事物”〔6〕。倚仗这一支持，周友华得以继续在北京寻找同志，并推销其“新理论”。终于，一个名叫“‘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小组，于1968年3月在中科院正式成立。学习班的成员，包括周友华和来自中科院几个研究所及北京一些高校的十几位年轻的科技工作者〔7〕。学习班的成员中，没有一个人的学术职称在助理研究员以上〔8〕。不过，当时身为副研究员的数学家秦元勋也积极参与了批判运动，虽然他可能并非学习班的正式成员〔9〕。秦自称，他之所以参与批判相对论，是因为该学习班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是毛泽东的女婿孔令华（1935—1999）〔10〕。显然，孔令华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增加了学习班的权威性，并吸引了其他人加入进来。

孔令华是孔从洲（1906—1991）中将之子，1950年代早期在北京八一学校与毛泽东的女儿李敏结识，两人于1959年8月结婚。李敏的母亲是毛泽东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1956至1962年间，孔令华在北京航空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理工科毕业的孔令华，对相对论、自然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都非常感兴趣，并在1960年代经常与毛泽东讨论相关的问题。1963年，孔令华曾把刚刚复刊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转送毛泽东，其中刊载的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之《关于新基本粒子的对话》一文，使毛泽东深感兴趣，并由此引发了毛对现代物理学之哲学问题的一系列评论。关于相对论，毛泽东曾对孔令华说，“从牛顿的绝对论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到相对与绝对统一论，这就是科学认识的辩证法，应当从这个高度来看待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遵照毛泽东的教导，孔令华与其好友柳树滋在北京航空学院组织了一些高校青年教师，“试图在承认爱因斯坦相对论是相对真理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验两个方面进行突破。”为了此事，孔曾“废寝忘食地忙碌了两三年的时间”。〔11〕

从一开始，学习班就将相对论作为主要批判目标，并因此简称自己为“批判相对论学习班”〔12〕。他们选择相对论作为攻击目标，原因是多重的。首先，相对论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科学理论之一，对一群想出风头的人来说，相对论是理所当然的批判对象。其次，为了达到创造一种新的所谓无产阶级科学的目的，批判者们不得不推翻所有现存的资产阶级理论，而相对论似乎正是这些资产阶级理论的一个典型代表。第三，众所周知，在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的过程中，马赫的思想对他有过重要的影响。由于马赫曾在1908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受到列宁的猛烈抨击，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也常因此受牵连，而遭到“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批判。这样的例子，我们在上一章中已经见过许多。

《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是当时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件，依照这两份文件的精神，“批判相对论学习班”认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的严重错误就是目前阻碍自然科学前进的最大绊脚石之一”，因此“（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相对论，革相对论的命，自然科学才能前进，新的自然科学理论才能建立。舍此，就不能把自然科学理论推上一个新阶段”〔13〕。

1968年6月，“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写出了第一篇文章，并自称之为“批判相对论的开端”。文章的标题很长：“彻底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评相对论的基础——光速不变原理”。作者将批判相对论同反对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观点相联系，认为只有“把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批深批透，才能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从而巩固无产阶级在自然科学领域对资产阶级的专政。”〔14〕。批判者宣称：“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自然科学革命都无法与之比拟的无产阶级科学革命，即将出现在世

界东方辽阔的地平线上。这将是历史上第一次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彻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势下开展起来的科学大革命。”（15）

为了打倒相对论，他们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政治标签和借口。例如，他们称相对论是“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也就是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16）批判的焦点之一是光速不变原理，这是狭义相对论的两项基本假设之一。批判者声称，光速不变原理是西方资产阶级反动的政治观点的深刻反映。因为恒定的光速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终极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学是人类科学的极限”。他们认为光速不变原理“根本违反了唯物辩证法”。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荒谬论点，批判者还以光速不变原理“没有得到实验的直接验证”为由反对相对论，（17）但这个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1905年，爱因斯坦在已知的所有实验事实的基础上提出了光速不变原理。虽然该原理在当时确实只是一项假设，但到1965年时已经有许多实验证据直接证明了光速不变原理的正确性。（18）

“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文章，蓄意将相对论与哲学上的相对主义相混淆。例如，该文引用了毛泽东1937年的一次未发表过的讲话，在讲话中毛批判了相对主义（relativism）。由于讲话中所批的“相对主义”在当时也译作“相对论”，和物理学上的相对论（theory of relativity）写法完全一样，读者如果不仔细参照原文的上下文，就很容易将两个不同的概念弄混，以为毛所批的是物理学上的相对论。但是，任何对哲学有基本了解的人都能看出毛泽东的讲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因此，事情很清楚：“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是故意要混淆两个概念，以便利用当时在中国已经被神化的毛泽东的权威。在该文的结尾，“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宣布了这场相对论批判将要导致的结果：“无产阶级就一定能够牢牢地占领自然科学的全部阵地，资产阶级学者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一个个崭新的科学理论，必将迅速地发展起来，自然科学发展真正的新纪元一定会首先在我国到来！”（19）

1968年7月初，中国科学院革委会将此文呈送毛泽东主席、林彪副主席、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同时附上的还有两份报告，分别为“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和中科院革委会所作。学习班在报告中称他们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开展无产阶级科学革命，创立我国自己崭新的理论体系”。中科院革委会则请求中央批准和支持将“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当）作典型试验，取得经验”，以便今后在生物学、地质学和其它自然科学领域也开展类似的批判运动。（20）

1968年中至1969年中，“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继续搜集新材料，以撰写更多批判相对论的文章。（21）这期间，学习班的成员也不断增加。（22）不过，直到1969年下半年，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才受到了党内高层的有力推动和支持。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九大”使文革头3年中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得到了合法化。1969年8月27日，中国共产党的3个主要喉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题为《抓紧革命大批判》的社论，提出“要开展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斗、批、改。”（23）

8月，“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完成了一篇文章，《相对论批判》讨论稿。其基调与第一篇文章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只是其哲学批判的调门更高、内容更广泛。例如，该文断言：“相对论的大前提是哲学的相对主义；相对论的时空论是资产阶级的唯我论；相对论的基本原理根本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围绕相对论的争论，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学术讨论的范围，始终充满了两种宇宙观的搏斗，同政治斗争的联系极为密切。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彻底批判相对论的哲学谬误，重新审查它的物理内容，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24）

为了驳倒相对论中同时性的相对性，学习班里的一位年轻物理学家甚至捏造了耸人听闻的

论据。1969年3月初，中苏两国在中国东北边界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发生了一系列曾被广泛宣传的武装冲突。中方在这些冲突中伤亡数百人，并在全国各地的举行抗议示威，反对苏联修正主义者的大国沙文主义（25）。这位年轻的物理学家将中苏边界冲突与批判相对论联系起来，声称如果像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所说的那样，同时性是相对的，那么就不能客观地判断在珍宝岛事件中到底是谁开了第一枪（26）。这种蛊惑人心的论点隐含了一种政治威胁，即任何企图为相对论辩护的人都可能被冠以卖国贼和苏修分子的罪名。但这种蛊惑并不能愚弄任何严肃的中国科学家，连非专业人士也哄骗不了。例如，当时的中科院副院长、1918年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竺可桢（1890—1974），在自学了一个多月的物理学相关经典著作之后，即能从这位批判者的论点中发现概念错误。竺可桢指出，由于苏联和中国同在一个行星即地球上，故处于同一参照系，人们并不能从相对论得出上述结论（27）。因为相对论中同时性的相对性，是一种只与处于不同的惯性参照系中的观察者有关的现象，所以它并不能应用于中苏边界冲突。然而，像竺可桢这样的科学家是不可能阻止当时的批判浪潮的。10月，“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完成了《相对论批判》的修改稿并印发全国，企图在全国掀起针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大批判（28）。

1969年秋，这场批判运动由于陈伯达（1904—1989）的亲自支持而得到了重大的推动。陈伯达长期担任毛泽东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顾问，并曾任毛的政治秘书，是文革早期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29）。1966年5月，毛泽东亲自任命陈伯达为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该小组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总指挥部（30）。到1969年初，陈伯达在党内排名已升至第四，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31）。

自1969年秋天起，陈伯达就密切关注着对相对论的批判。他对批判运动作过多次批示，派他的联络员常驻学习班，并指派《红旗》杂志社的编辑到学习班帮助修改文章。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是陈伯达的理论批判计划中的两个中心议题之一。按照他的计划，科学家应该批判爱因斯坦，艺术家必须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32）。不过，为什么陈伯达如此热衷于支持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运动呢？这其中有两个可能的动机。在政治上，陈伯达大概以为，这场批判运动可以在他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权力竞争中助其一臂之力（33）。有证据表明，在1969年10月以前，陈伯达就已经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早在1967年2月，毛泽东就曾愤怒地责备陈伯达，未经其批准就打倒了政治局常委陶铸（34）。1969年初，陈伯达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竞争中输给了张春桥和姚文元。毛泽东批准了张、姚二人起草的报告，却将陈伯达的报告连看都没看就原样退回了（35）。作为曾为毛泽东和党中央起草过许多重要文件的“党内著名理论家”和“笔杆子”，这次意外的失败对于陈伯达来说是一大羞辱（36）。像陈伯达这样野心勃勃的人，必定会寻找一切机会卷土重来（37）。中科院开展的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运动，似乎给了陈伯达这样一个机会，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陈伯达可能事先已得知上述毛泽东与其女婿孔令华关于相对论的谈话，（38）因而认为支持对相对论的批判是一条取悦于毛泽东的捷径。其次，陈伯达是前中科院第一副院长，在文革期间仍对中科院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由于“批判相对论学习班”隶属于中科院，故易于为陈所控制；而它发起的相对论批判，似乎也开辟了一条新战线，如有斩获，陈伯达当可独享其功，并重建他的权力基础，以便与来自上海的竞争者相抗衡。

陈伯达积极支持和推行对相对论的批判，还与其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有关。（39）自1966年以来，他曾多次公开宣称：“人类的文化是从东方开始的，后来转到了西方；经过一次往返，现在又在更高的水平上回到了东方”（40）。1970年4月，陈伯达亲自来到北京大学召开会议，鼓动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并再次提出，“过去科学是从西向东，从欧美到中国，将来中国要领导科学，为此要彻底批倒相对论。”（41）显然，陈伯达是希望恢复中国科学技术在古代世界中所占有的显赫地位。在本质上，他是企图复兴“中国文化中心论”的偏见，这一偏见过去曾经长期被保守的思想家用来抵制西方思想。只是这一次，陈伯达是在马克思主

义旗下”推行他的文化民族主义的。(42)因为“批判相对论学习班”也提出要推翻西方资产阶级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统治,以“创立我国自己崭新的理论体系”,(43)陈伯达一定觉得这场批判正合其心意。

在陈伯达的指示下,“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文章《相对论批判》已预定于1970年1月在《红旗》杂志和《中国科学》上发表,《红旗》和《中国科学》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期刊中的两种。但当时中科院的负责人刘西尧(44)似乎对此决定较为谨慎。他决定邀请一些著名科学家来审查这篇文章,中科院遂于1969年10月23日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45)

参加会议的有“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成员,以及周友华等人。(46)一批著名的中国资深科学家如竺可桢(1890—1974)、吴有训(1897—1977)、周培源(1902—1993)和钱学森(1911—)等也奉命出席(47)。由于周培源早年是相对论研究的专家,而且在1930年代又曾与爱因斯坦有过个人交往,因此陈伯达特意亲自将周培源从陕西汉中召回北京。(48)另一位著名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1907—1998)也接到通知,但拒绝出席,这是不同寻常的。它可能既反映了王淦昌作为中国核武器专家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也显示出他超凡的勇气(49)。出席此次会议并踊跃发言的,还有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1927—)。

会议由当时领导中科院工作的军代表之一郝梦策主持(50)。在郝代表和院革委会常委戴霁漠的开场白之后,第一个发言的就是量子场论专家何祚庥。何赞成批判爱因斯坦,并声称,“批判爱因斯坦不(应)限于相对论”,实际上“有四大问题”须要批判。他认为,批判爱因斯坦不仅要批判相对论中的“相对主义时空观”,还须批判“统一场论”、“宇宙有限论”,以及爱因斯坦否定量子力学的某些观点。他认为,这四方面问题中,以统一场论的问题最为突出。何指出,爱因斯坦未能完成统一场论与其不正确的世界观有关,称其“早年是受马赫主义的影响,晚年(则相信)斯宾诺莎的唯理论。”关于爱因斯坦的政治表现,何祚庥特别强调,爱氏“曾写信给罗斯福建议制(造)原子弹,为美帝效劳,这是肯定的。”何还提到,“听周培源同志说,爱(因斯坦)逝世时周总理打了电报去。”在具体谈到《相对论批判》一文时,何祚庥不同意文章中所谓“相对论的两个大前提并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的说法。他指出,“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一个实验与相对论预言有矛盾。”在宣读了一段毛泽东主席关于用实践检验理论的正确性的语录之后,何祚庥认为,“说‘相对论的两个大前提并没有得到实验的证实’是不对的,只能说没有直接的证实,但有间接的证实。所谓证实是指在一定精确度范围内(的证实)。”以后,在他的第二次发言中,何祚庥还针对批判文章中许多具体的提法提出了批评。显然,他对批判爱因斯坦的大方向是肯定的,但不同意《相对论批判》一文中的许多具体内容。(51)

由于何祚庥在发言中提到了他的名字,周培源紧接着也作了发言。周培源先介绍了爱因斯坦的生平和工作,在介绍过程中,他在许多方面含蓄地为爱因斯坦辩护。例如,周培源说爱因斯坦“生活比较朴素”;爱因斯坦是犹太人,而“犹太人在欧洲和黑人在美国一样(受歧视),因此他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周培源提到爱因斯坦“爱拉小提琴,(并)觉得比自己的物理高明得多。”(52)这句看似漫不经心的短语,对于有心之人则可谓意味深长。这则富有爱因斯坦式幽默的逸闻,既是对那些狂妄而又无知的批判者的一种嘲讽,又可博得那些同情爱因斯坦却又不能明说的中国科学家们会心的微笑。

周培源特别介绍了爱因斯坦与美国原子弹的关系,指出对于这件事要作“阶级分析”。爱因斯坦“主张做原子弹”是“因为当时纳粹要搞原子弹”,而且他并没有直接参加制造原子弹的具体工作。周还提到爱因斯坦在1955年曾与罗素联署宣言,反对制造氢弹,并称该宣言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但同时也指出,宣言是“从人道主义出发,而不是从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出发”的。周培源证实,1955年爱因斯坦逝世后,周总理发了唁电,并对爱氏“有

一定评价”。周总理还叫周培源写了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周培源写了一半，记者写了一半。（53）

对于《相对论批判》一文，周培源虽没有作直接的批评，但他上来一句“很抱歉，……文章也没好好看”，便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该文的反感。由于该文在科学上主要是对狭义相对论的两条原理（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提出批判，周培源将其发言的大部分时间用于介绍这两条原理的发展历史，并强调，“（这）两条原理是很重要的”。关于同时性的问题，周培源指出，在同一惯性系中，同时性是很明确的；对于两个作相对运动的惯性系来说，“同时性没有意义，但这不是说同时没有意义。”针对何祚庥号召批判爱因斯坦的“宇宙有限论”，周培源指出，“宇宙有限的模型”主要与爱丁顿（A. S. Eddington）的吹捧有关，“早已放弃了”。（54）

无庸讳言，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周培源也不得不在发言中对爱因斯坦作了一些明显是敷衍了事的批评。他曾说“统一场论是完全错误的”，但同时又强调了爱因斯坦在1930年代对“运动理论”的研究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他在发言中还客观地谈到，广义相对论里有争议的问题很多，比如坐标应如何定义的问题。这是周培源自1930年代起，就开始思考但未能解决的一个问题。显然他在此问题上与爱因斯坦意见不同，但并没有在此审查会上利用这些科学上的不同意见，来谋取政治上的好处。（55）

在发言中，周培源还借机建议中科院做一些像穆斯堡尔效应一类的实验，以帮助检验狭义和广义相对论。（56）这实际上是建议科学院恢复基础科学的科研工作。在当时科研业务工作受到全面冲击、基础科学的研究几乎被完全取消的情况下，周培源的建议有重要的意义。

钱学森在周培源之后接着发言。他的发言以当年流行的“套话”开头。钱说他读了《相对论批判》的“讨论稿”和“修改稿”，使他“受到很大鼓舞、启发和教育”，他“是（怀着）满腔热忱来参加这次会（议的）。”以下他谈了四点意见。第一点，他认为，该文“是（科学院）好多青年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后，活学活用主席思想，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取得的初步成果，这个意义是重大的。”为此，他向有关的人员“表示祝贺”。第二点，对爱因斯坦的评价要全面和客观。钱强调，“这个事要慎重”，因为爱因斯坦是在全世界都有影响的。钱学森还指出，对于爱因斯坦建议做原子弹也要具体分析，“因（为）海森堡在德国也在搞，当时要抢在纳粹的前头。”这里，钱明显是在附和周培源的说法，并改变了他自己于1965年在《人民日报》上就此事所发表的观点。第三点，应该将相对论本身与围绕在相对论周围的“乌烟瘴气的东西”区别开来。钱学森举例说，“罗马教皇也用过相对论，……想借相对论为他们张目，但这和相对论本身要有区别。”钱认为文章对这方面的区别工作，做得还不够。第四点，“哲学和自然科学理论的关系。”钱学森宣称，“辩证唯物论是人类的最高智慧，全面经验汇总到毛泽东思想。”他告诫说，在证明相对论这个理论时，“千万不能忘记了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依靠这个。”最后，钱学森希望该批判文章能写得“更深入”，希望“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成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下苦功夫，扩大已得的成果，（以）取得伟大的胜利。”（57）

《相对论批判》审查会开了一整天。在下午的会议上，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也作了发言。他首先表示，“（他）是学实验物理的，相对论是用过，但对相对论的基础没有考虑过”。吴谈到1922年，他曾亲耳聆听洛伦兹的演讲。“（洛伦兹）非常推崇爱因斯坦，说爱因斯坦的理论比他高明，所以搞理论物理的人更推崇爱因斯坦了。”吴说，“爱因斯坦是唯心主义者，恐怕他自己都承认。”吴有训声称，“很支持”“几位青年同志用毛泽东思想进行批判，”他完全同意钱学森上午的发言，建议中科院支持并扩大该批判运动，因为“相对论涉及面太广”。吴的建议似乎也有借机使科学院恢复科研工作之意，而且要扩大范围，不仅仅限于物理所。至于《相对论批判》一文本身，吴有训显然认为文章的表述和概念都不够清楚，当然也就没有足够的说服力。他还对文章的一些关键论点，如“单程光速不可测量”等，提出了质疑，并尖锐地批评指出：

从文章（的观点）看来，实际上存在以太，而相对于以太的运动是可以测出来的。因此，不但光学、电磁学领域中存在优越坐标，而且在一切物理学领域都存在一个绝对坐标，即存在绝对的以太。这样，相对于以太的运动，就成了“绝对运动”。显然，这不是什么“革命”和“进步”，而是倒退。（58）

周友华也在下午发了言，并再次鼓吹，“对相对论的批评是很重要的，这关系到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向资产阶级夺权、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大）问题，大方向是对的。（它要）让毛泽东思想占领自然科学（领域的）一切阵地。”他还叫嚣，“一定要把这一工作坚持到底。”（59）

主持会议的郝代表所作的总结发言，可能最能说明这场相对论批判运动的荒唐性质。他说，“我是外行，是个用枪杆子的，本来没什么可说。但（我）有点朴素的（阶级）感情，我感觉爱因斯坦这个人要批判一下。听说他是一个权威，束缚（了）很多人的头脑，就想造他的反。为什么不能批判一下？我们不能由他束缚我们的头脑。另外，他最后三十年无所作为，就否认了他以前的（工作），（因为）这世界观是一贯延续下去的。因此要批判。我同意大家的意见，批判要走群众路线，关心的人很多，应该发动群众。物理所能否自己展开批判？可以试一试嘛，发现最后还有个绝对真理也好嘛！批判的角度大家不同，凑起来不就全面了？大家都来搞，就可以把爱因斯坦的问题搞清了。争取再过几个月，能拿出两、三篇文章出来。”（60）

郝代表的最后一句话，已经暗示《相对论批判》未能通过审查。的确，与会的大多数物理学家都反对“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这篇文章，虽然很多人说得很含蓄，而且批评意见也主要集中于具体的科学证据和论点。许多与会者表示，他们总的来说支持这场批判运动。有些人是真心这么想，但其他更多的人只是虚与委蛇，以免惹来政治上的麻烦。不过，资深的科学家中几乎没有人赞同《相对论批判》一文，更不用说支持它的发表。该文章最终没能在《红旗》或《科学通报》上发表，这至少部分地是由于周培源和其他资深科学家的反对。（61）在得知陈伯达计划将这篇《相对论批判》发表的消息之后，周培源在会后私下对刘西尧说，“批判相对论的文章不宜刊登在《红旗》上，否则，将来我们会很被动，相对论可以讨论，但不能打倒。”（62）周培源显然非常担心，这场批判可能会使中国在国际科学界的声望受到严重损害。

尽管陈伯达在发表《相对论批判》一文的问题上受挫，他仍继续推动该批判运动。1970年4月3日，陈伯达到北京大学召集会议，亲自鼓动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进行批判。他强调，有必要开展全面的大批判，以重新审查和估计过去的一切科学理论，超越牛顿和爱因斯坦。陈伯达要求专业科学工作者向中小学的“革命小将”学习，坚持让中小學生也参与批判相对论，因为他们“思想活跃，眼光敏锐，兴趣广泛，很有生气”。陈伯达进而提出，要召开万人大会，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不过，由于陈伯达出人意料地倒台，批判大会并未举行。（63）

在这次北大之行中，陈伯达再次召见了周培源。在陈伯达鼓吹了为何应彻底批判相对论后，周培源坚定地回答说，“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已被事实证明，批不到。广义相对论在学术上有争议，可以讨论。”（64）陈伯达并不懂相对论，但执意要批判它。4月8日，陈伯达再次指示刘西尧抓紧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他还下令创办一份特别刊物，来发表有关的批判文章。（65）按照陈伯达的指示，中科院成立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以及刊物编辑部。（66）这份刊物后来被命名为《相对论问题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该刊物的名称用的是“讨论”而不是“批判”或“批评”，这可能与周培源一再的警告有关。（67）

《相对论问题讨论》第一期于1970年6月出版，共发表了6篇文章，其中来自北京的有4篇，来自上海的有2篇，北京和上海是当时批判运动的两个中心。《相对论问题讨论》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所写的《相对论批判》。文章的内容与学习班以前的三份草稿大致相同，但也有一些次要的更改。例如，文章不得不承认，相对论并不是哲学上的相对

主义。(68)

来自北京的另一篇文章显得很特别，因为它与整个批判运动的基调明显不合。文章作者是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的“基本粒子理论革命大批判小组”。此文肯定了狭义相对论的正确性，列出了23项实验结果，以证明狭义相对论坚实的实验基础(69)。这篇文章的发表，清楚地显示了科学家中间对这场批判运动的抵制。或许该刊物的名称《相对论问题讨论》可以解释为什么一篇反对批判运动的文章会被选中发表：为了显示这是一场讨论而非单纯的批判，编辑必须发表双方的观点。不过，由于其它5篇文章均持严厉批判的态度，选择发表这篇文章可能只是为了装装样子。在这一期《相对论问题讨论》中，来自上海的2篇文章也很引人注目，因为它们的批判调门是6篇文章中最高的，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一点。(70)

《相对论问题讨论》的出版，标志着北京的批判运动达到高潮(71)，这主要依赖陈伯达的支持。陈伯达于1970年8月垮台。不久，北京的有组织的相对论批判运动“也就草草收场”了。据称“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大多数成员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由批判转为研究甚至捍卫相对论。学习班里的中科院成员后来在物理研究所单独组成了一个研究室，研究引力、基本粒子理论、天体物理学等与相对论密切相关的问题。结果，这些物理学家能够做大多数其他中国科学家当时所不能做的事：专注于科研并探索前沿科学问题(72)。事实上，有些物理学家决定加入“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就是因为在其中有可能重新开展研究工作，并享受查阅科研文献的“特权”(73)。此外，一些前学习班成员甚至在文革后期公开捍卫相对论，批驳荒谬的批判言论。这些“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成员的态度转变，标志着中国批判运动的分化，使顽固的批判者们，特别是“上海理科批判组”的成员，深为不满。他们将这些转变了态度的学习班成员视为“叛徒”(74)。不过，正如我们后面将在《物理》杂志上的“相对论讨论”中所要看到的那样，一些“叛徒”仍继续对爱因斯坦的哲学观点持批判态度。

◇ 上海的批判运动

上海的相对论批判运动开始得比北京晚。1969年，为了与陈伯达竞争，张春桥和姚文元指使其上海的亲信，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也积极开展批判。北京的批判于1970年末收场之后，上海的批判却愈演愈烈(75)。从1972年起，上海的激进分子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政治动机是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因为这时的周总理已是他们获取更高政治权力的主要障碍，而且周总理不久前还曾公开赞扬爱因斯坦(76)。上海方面的批判运动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

1969年7月，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亲信王知常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会议，动员物理系的教师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王知常指使复旦的物理学家们成立一个专门的批判写作组。为了引诱科学家们加入这个批判组，王知常承诺，其成员可以享有不参加体力劳动和政治学习的特权。但是事实证明，想引诱复旦的物理学家参与批判并没有那么容易。例如，物理学家戴显熹就曾在会上质问王知常：批判相对论的科学根据何在？(77)。虽然王知常未能、也不可能给出什么像样的回答，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和上海的其他激进分子在复旦大学成立了一个写作班子，名为“上海市理科革命大批判写作组”(以下简称“上海理科批判组”)，主要由复旦大学的物理系、哲学系与历史系的教师以及《文汇报》的记者所组成(78)。“上海理科批判组”听命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而后者在1967年以后为上海市的党政领导机关，由张春桥、姚文元及其亲信所把持。

从一开始，复旦大学的一些老物理学家就对这场别有用心的批判运动十分不满，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抵制(79)。当然，这些抵制行动是十分危险的。例如，周同庆教授(1907—1989)虽然受到上海激进分子的压力，仍然拒绝支持对爱因斯坦的批判(80)。“上海理

科批判组”的头头们指令他和其他资深的物理学家们翻译供批判用的材料，并得意地称其是让这些物理学家“挖自己的祖坟”（81）。周同庆有意地翻译了些与批判不相关的东西，结果被指控抵制对爱因斯坦的批判运动，被公开批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82）。

在陈伯达对北京的批判运动亲自表示支持后，姚文元也于1969年10月初把朱永嘉召到北京，策划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进一步批判（83）。朱永嘉是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组长，直接领导“上海理科批判组”的工作。在姚文元的亲自指示下，“上海理科批判组”于1970年1月起草了一篇题为《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文章，宣称“相对论的要害是相对主义。相对论的组成部分是：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形而上学的宇宙论（和）神秘主义的方法论。”该文还恶毒攻击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爱因斯坦就是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当代自然科学领域中资产阶级反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的典型”，“不把相对论之类的反动理论打倒，什么新科学，新技术都是建立不起来的”。《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于1970年6月发表在第一期《相对论问题讨论》上，在同一期发表的文章中，这一篇的批判调门最高。（84）

北京的“批判相对论学习班”解散后，“上海理科批判组”也在1971—1972年间偃旗息鼓了一段时间（85）。1971年9月，党的唯一一位副主席、毛泽东钦定的接班人林彪在反毛政变失败后乘飞机突然出逃，最后机毁人亡。林彪事件事实上已经宣告了文革的破产，党内外许多人由此对毛及其激进政策产生了怀疑。因此，该事件对给毛泽东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其健康状况也因此迅速恶化，党的日常工作则由周恩来主持（86）。从1971年底开始，周恩来发动了一场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在科学和教育领域，这场斗争推动了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和教育的恢复工作。（87）在此前动乱的5年中所执行的极左政策，已摧毁了中国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学科的理论研究。对此深感忧虑的周恩来，早在1970年就提出，要“搞点基础研究，把实践提高到应有的理论高度”。（88）1972年夏，旅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访华，于7月1日在北京与周总理会面，敦促他“考虑采取重视基础科学的政策”（89）。两星期后，周恩来在会见一个由12名美籍华裔教授组成的代表团（大多数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时（90），宣布了杨振宁的建议。他指示北大副校长周培源“要把北大的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91）。9月5日，周恩来会见了来访的巴基斯坦理论物理学家萨拉姆（Abdus Salam）。会后，周恩来又指示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的领导人要特别重视“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特别是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设计与制造。（92）

周恩来还亲口赞扬了爱因斯坦，这可能是为了消除陈伯达批判爱因斯坦所遗留的影响，并提高理论科学家的地位。1971年11月，周恩来在与一些意大利客人会面时说，“犹太民族出了一些杰出的人才。马克思是犹太人，爱因斯坦也是犹太人”（93）。1972年夏，作为周恩来最主要支持者之一的周培源，也在一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公开表示反对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94）。

不幸的是，周恩来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并未能肃清极左的思想和作法。它反而更进一步地激怒了极左派的领袖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即所谓的“四人帮”。周恩来受挫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他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到1972年底，这些激进派已使毛泽东确信，周恩来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已经走得过远。毛泽东有效地制止了周恩来的反对极左思潮的运动，并转而整肃“极右”，这使得激进派得以恢复他们的攻势。（95）

从1972年底开始，这些激进领导人便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攻击周恩来。对姚文元和他的同伙来说，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是反击周恩来对恢复中国科学和教育的发展所作努力的一个有效途径。1971—1972年间，尽管“上海理科批判组”并没有发表任何文章，但其成员仍继续为姚文元和其它激进领导人准备一份批判文件（96）。在姚文元的亲自指点下，

该批判组在此期间对这一文件又作了许多修改。1972年9月，姚文元终于批准了这份题为《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文件。在毛泽东阻止了周恩来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后，“上海理科批判组”开始准备发表一系列的批判文章（97）。从1973年10月至1974年9月，“上海理科批判组”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改编成分别讨论时空观、运动观、物质观和世界观的四篇长文。按照姚文元的指示，所有4篇文章都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用“学术”的外衣来掩盖其政治意图（98）。这可能是为什么姚文元及其亲信没有像陈伯达那样，试图在其所控制的《红旗》杂志上发表他们的批判文章。

到1973年8月底，“四人帮”已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在党内的权力，特别是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99）。1973年10月，4篇批判文章中的第一篇《评爱因斯坦的时空观》在《复旦学报》上发表。“上海理科批判组”一方面不得不承认爱因斯坦在推翻牛顿绝对时空观、发现时空相对性所扮演的革命角色，另一方面又指责爱因斯坦走得太远。结果，爱因斯坦的时空相对性变成了相对主义，而根据列宁的教导，相对主义又必将堕落为“唯心论的时空观”（100）。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文的作者几乎马上又自相矛盾地断言，由于空时间隔的不变性，“相对论其实是‘绝对论’”（101）。“上海理科批判组”还攻击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的弯曲时空。因为“弯来弯去，最后总要弯成有限而闭合的圈圈”，因而是“明目张胆的宇宙有限论”。在第4章，我们曾提到苏联的日丹诺夫对相对论宇宙学中有有限宇宙的批判。遵循类似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上海理科批判组”同样不能容忍有限宇宙，因为他们认为，“有限的物质世界以外总要有非物质的、超自然的东西（存在），这只能是上帝。”（102）

“上海理科批判组”的另外3篇文章，基本上沿袭类似于第一篇批判文章中的逻辑和观点，批判了所谓的爱因斯坦的运动观、物质观和世界观。总的来说，“上海理科批判组”以轻描淡写的方式承认，爱因斯坦“在某些个别（物理）问题上也有所前进，”并推进了人们对时间、空间和物质的认识（103）。但该批判组在其文章中所要强调的是：由于爱因斯坦不懂得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104），他的相对论仅仅将他引向了相对主义，并最终“滚进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泥坑”（105）。所有4篇文章中都充满了从爱因斯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及其他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中断章取义摘引的词句（106）。没有任何一篇文章具有前后一致的观点或者清晰的逻辑结构，也没有一篇文章给出真正科学的、历史的、或者是哲学的分析。除了对相对论及其历史演变的一些肤浅的介绍，“上海理科批判组”最常做的，只是滥用各式各样的哲学标签来攻击爱因斯坦的理论及其哲学解释。例如，“上海理科批判组”的成员认为，质能等价和四维能量—动量张量是唯能论的样本（107）；他们断言爱因斯坦是马赫主义者（108），指责爱因斯坦的统一场论的思想完全是“陷入唯心论的先验论”，并讥笑爱因斯坦未能建立其统一场论，称之为科学上一个“巨大的流产”（109）。

◇ 对相对论宇宙学的批判

1973年6月，“上海理科批判组”在新创刊的《自然辩证法》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攻击“反动资产阶级”的大爆炸宇宙学（110）。这一争端起源于新创刊的《物理》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关于标量—张量理论中含物质及黑体辐射的宇宙解》（111）。该论文标志着中国对相对论宇宙学的研究的开始。其作者方励之（1936—）于195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当时周培源教授和胡宁教授都在该系任教（112）。大学毕业后，方励之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即现在的“原子能所”的前身），领导一个12人的理论小组，研究设计生产钚的核反应堆，这应该是当时机密的核武器工程的一部分（113）。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方励之被打成“严重右倾”，以后又被开除出党，调离机密的研究工作，并于1958年重新分配到在北京新成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科大”）任教。1960年代初，方励之在粒子、凝聚态和激光物理学研究方面都非常活跃。1969年，他

和科大物理系的同事们被下放到安徽淮南的煤矿劳动（114）。在淮南，方励之偶然发现了一本苏联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朗道（Lev Landau, 1908—1968）的《经典场论》。他背着监管人反复阅读了朗道的著作，并从此迷上了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研究：“在淮南的几个月中，朗道这本书成了我在劳动之后最心爱的读物，也是唯一的寄托。每当暗夜降临，一身疲惫躺在（蚊）帐子里的我，其灵魂往往就已经随着膨胀的宇宙去寻找那优美动人的原初奇点了。”（115）

到1971年底，方励之已转而研究天体物理，但苦于缺乏对该领域当前文献信息的了解（116）。1972年春，临时到北京工作的方励之，在中科院找到了当时的天体物理学文献，并有机会与其他兴趣相同的物理学家讨论。在听说《物理》杂志即将创刊后，方励之便迅速地完成了上述论文，利用“‘标量—张量理论’（一种引力场理论）和黑体辐射数据来计算宇宙演化的基本空间和时间性质”。文章发表后还不到6个月，就成为“上海理科批判组”的攻击目标，因为该文所支持的大爆炸宇宙论直接与辩证唯物主义有关宇宙无限的教条相抵触，因而被认为是反动学说（117）。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宇宙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无限性的争辩，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相对论宇宙学于1930年代在苏联受到谴责，最引人注目的是日丹诺夫在1940年代末的抨击。日丹诺夫的讲话早在1948年就被介绍到中国，并很快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接受（118）。这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相对论宇宙学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虽然并没有明文禁止，但在方励之以前，没有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过相对论大爆炸宇宙学方面的科学论文。（119）这种情况当然也与大爆炸宇宙学自身的发展历史有关。大爆炸宇宙学虽诞生于1940年代，但直到1965年发现宇宙的3.5微波背景辐射之后，才开始在国际物理学界“热”起来。（120）而此时的中国已经陷入文革初期的狂热与极度的混乱之中，根本不可能从事有关的研究。对于大多数中国的科学家来说，当时甚至很难充分了解到国际上科学研究发展的前沿动态。在极左思潮和实用主义盛行的文革期间，方励之得以突破多年来意识形态上的禁忌，发表支持大爆炸宇宙学的论文，这看似不可思议，（121）但仔细分析起来却是可以理解的。首先，到1972年，文革的高潮即最动荡的时期已过，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正领导着一场反对极左思潮的斗争，并强调要恢复基础科学理论的研究。其次，当时国际上关于大爆炸宇宙学的研究正蓬勃发展，并已发表了许多论文，方励之在准备其论文时就参考利用了其中一些西方文献。（122）第三，当时北京的相对论批判的闹剧已经收场，上海的批判尚处于半休眠状态，而方励之所在的科大又地处远离上述两个政治中心的安徽省，这使方励之有相对来说较高的自由度，来决定自己的研究课题。（123）第四，当时在中国，研究天体物理和引力理论的队伍有所壮大，使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可以相互交流、共同讨论的研究群体。（12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天体物理研究得以加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批优秀数学家的加盟，而这却是激进派片面地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结果。（125）

方励之公开支持所谓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大爆炸宇宙学，激怒了“上海理科批判组”和其他正统马克思主义批判者。为此，他们很快组织了一场批判方励之及其支持者的运动。从1973年初至1976年秋，在全国性的报刊和学术杂志上，至少有30篇文章针对大爆炸理论或方励之的论文做了批判，其中许多批判文章出自“上海理科批判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场对大爆炸宇宙学的批判却也带来了批判者们始料未及的后果。例如，中国天文学家们就得以借开展“大批判”的名义，在1974年恢复召开了各种全国性的天文学会议（126）。1975年，由于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激进分子再次退居守势（127）。是年秋，方励之及其同事们得以发表一篇回应批判的文章。在这篇题为《河外天体红移是可以认识的》的文章中，方励之认为，“无论大爆炸理论正确与否，射电天文学等最新进展已使得宇宙学成为一门实验科学，可以通过通常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哲学讨论来研究”（128）。1973年，方励之和他在科大的4位同事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天体物理学研究小组，在1970年代发表了大量文章。这个小组后来发展成了科大的天体物理中心，霍金在1985年称赞该中心“达到了当时

天文学和宇宙学研究的最新水平”(129)。同年,方励之与其日本合作者佐藤文隆分享了美国“引力研究基金会”颁发的年度最佳论文奖,这被认为是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学领域的最高奖。(130)

◇ 《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

除了促成天文学全国会议的恢复,上海的批判运动还带来了另一个意外结果:《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与北京及其它地方产出的批判文章相比,“上海理科批判组”的文章对爱因斯坦的论著有更多的引述,而这些爱因斯坦论著又是大多数中国读者前所未知的。“上海理科批判组”的优势来自于没收的两份许良英的手稿:一部专著《爱因斯坦的世界观》和一部译著《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131)。商务印书馆在1964年底搁置了出版爱因斯坦哲学论著的计划之后(见第四章),于1965年初将译稿退还给许良英。此后,许良英继续润饰译文,并与合译者李宝恒于1965年合作发表了一篇文章(132)。可能正是由于这篇合作的文章,李宝恒在1966年文革一开始时便遭到了批判。红卫兵从李宝恒在上海的家中查抄了他与许良英合译的《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以及许良英所著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手稿。由于自1966年就与李宝恒失去了联系,许良英一直到1969年底才听说这两部手稿的下落(133)。

1969年11月底,一位来自北京的物理学家来到浙江临海许良英所在的小村庄,代表“批判相对论学习班”向许良英“借阅”他所翻译的《爱因斯坦哲学著作选集》(以下简称《爱选》)的草稿及有关资料,以便与把持着《爱选》成稿的“上海理科批判组”竞争。许良英从这位北京来的代表那里得知,“上海理科批判组”正在使用他的译稿(134)。于是许良英便于1970年1月30日写信给上海的批判组,表示希望加入批判工作,并请他们先将他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手稿还给他,“准备彻底加以改写”(135)。但许良英始终未收到该信的回复。又过了一年多以后,1971年10月,许良英得知商务印书馆已恢复出版业务,便写信给商务,看看他们是否能恢复从前的《爱选》出版计划(136)。10月27日,商务印书馆给许良英回信,要他立刻将《爱选》的成稿寄去,以便决定是否出版(137)。许良英于是开始努力向“上海理科批判组”索回他的译稿成稿。

许良英先给身在上海的李宝恒写信,“要他负责交涉取回《爱选》稿”。但李宝恒后来回信告诉许良英,说他做不到,因为译稿已被上海当局“正式借用”,还打了“借条”。当局告诉许良英和李宝恒,“这些稿子,现在要用,用毕,一定把原稿全部还给你(们)”(138)。但是,许、李二人并未被告知归还这些译稿的具体日期。许良英立刻写信给留下借条的沈铭贤,“要求在一个个月内寄还全部原稿”。在信中,许良英还希望借用者对他的“这些未发表过的劳动果实给以最起码的尊重。”但两个月后,许良英仍未收到其手稿,进一步的询问也石沉大海(139)。一位在上海的朋友建议许良英与当时的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组长朱永嘉联系,因为“上海理科批判组”隶属于该写作组(140)。许良英于1972年2月28日给朱永嘉发了一封挂号信,告诉他自己将于3月底去北京,要求他们在此以前归还他的两部手稿。3月27日,许良英终于收到了《爱选》的成稿原稿。但另一部手稿,长达17万字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却被告知已经“下落不明”。(141)

当许良英拿回《爱选》的译稿时,李宝恒告诉他,“上海理科批判组”已经让他和复旦大学的几位物理学教授对译稿进行了校对,“准备作为内部资料少量印一些”。既然只是“作为内部资料”,而且是“非正式地少量印一些”,许良英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直到5个月后才意识到,这些“内部资料”几乎毁掉了他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计划(142)。许良英于3月29日将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并在一星期后即得到正式答复。商务印书馆“认为此稿重要,决定尽速出版”(143)。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许良英留在北京校订、润饰译稿。他还从国外最近的出版物中发现了許多新发表的爱因斯坦著作。从这些新材料中,许又挑选了18篇文章,

添入译稿。6月，许良英回到浙江，继续校订译稿。7月，李宝恒也加入了对译稿进行修订和增补的工作，准备加译9篇从俄语文献中新发现的相关文章。许、李二人计划于10月上旬正式向商务印书馆交稿。（144）

就在许良英和李宝恒快要完成增补和修订工作之时，一则新书预告却使他们大吃一惊。9月份，一位北京的朋友告诉许良英，“上海理科批判组”（以“复旦大学编译组”的名义）将于10月份出版一本名为《爱因斯坦言论集》的新书。许良英将该书的预告内容与自己的译稿进行比较，发现它实质上就是自己于1965年完成的译稿的翻版（145）。决心捍卫自己呕心沥血多年的劳动成果，许良英于10月3日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徐景贤写了一封详细的申诉信（146）。10月12日，许良英又来到上海，亲自与上海当局的有关人员据理力争，以讨回公道。许良英的很多朋友都警告他说，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因为徐景贤和朱永嘉都是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亲信（147）。尽管如此，许良英还是继续申诉。当时，他的处境十分艰险，但却从未放弃。朱永嘉对许良英的执著和勇气感到吃惊，不得不派人与他谈判（148）。为了诱使许良英放弃他的要求，朱永嘉提出给他安排工作，在书上加署他的名字，并付予其文革期间罕见的稿酬。对任何处于许良英当时的境地的人（一个摘了帽的“反动右派”，被开除公职，并已被迫在乡下劳动了14年多）来说，朱永嘉所开的条件都是非常诱人的。但许良英却不为所动，坚持自己及其合作者对译稿所应有的权利。朱永嘉被许良英的固执要求所激怒，据说他曾暴怒地咆哮道：“我们出我们的书，与许良英无关”（149）。

（未完待续）
~~~~~

## 【研究报告】

### 上山下乡运动再研究：引起争议的几个问题

• 潘鸣啸（Michel Bonnin，法国）•

#### ◇ 上山下乡运动与文化大革命

把城市青年下放到农村参加农业活动早在1955年就开始了。自从1962年也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官方机构来负责这个工作。但是我认为文革前的运动与文革后的有很多不同的特征，而且规模不能比。从1955到1966年下乡知青不到150万人。从1967到1980年大约有1660万人。因此研究这个题目要一分为二。至于文革后的上山下乡运动，与文革究竟有什么关系，这要看“文革”的定义。我认为严格来讲，文革是1969年4月份九大时毛泽东重新恢复政治体制而结束了。从这个狭义来看问题，1968年底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潮开端就是文革结束的起点，因为青年被解散，红卫兵组织不存在了，就没什么“革命”可讲了。但是，另一方面，1968年后的下乡运动是文革的直接后果，是毛泽东通过文革而成立的“教育革命”的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因为这个运动被当作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新生事物”，所以1978年前没有人敢公开对这一政策提出质疑。而且在70年代，这个运动也成了各个政治派别之间互相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所以我认为这个运动在文革研究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我觉得历史学家对官方的“文革十年（1966—1976）”这个概念应该有所保留。一方面是要分清楚广义“文革”的两个阶段（群众积极参加的阶段和纯粹内部斗争的阶段），另一方面还要记得最深刻的历史转变不是在1976年发生而是在1978年。上山下乡运动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它的最繁荣时期是从1968到1977年，而且最多知青在乡下的一年就是1977年（见图一）。

#### ◇ 应该重新评价的历史大实验

上山下乡运动在中国甚至世界的历史上是个史无前例的改造一代人的大社会实验，也是个表面上凭“自愿”申请的大规模集体流放。现在城市里五十到快六十岁的人（一般来说是在他们的职业中最有影响力的人），有一半左右是当过知青，受过这个运动很深刻的影响，所以可以模仿毛1968年著名的指示而说：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让它接受中外专家的再评价，很有必要，也很可能。虽然我们还缺少很多资料来做研究（有关政治决策的内部档案，对社会和经济情况的具体与真实的报告等），但是比起70年代末80年代初外国专家对这个题目所做的第一波的研究，现在有很多新资料可作参考：有关当时的经济和社会情况的大事典与统计数字（包括中央知青办的部分档案和当时知青办干部1996年出版的有关资料），还有自80年代末开始出版的省志及市志等。在这方面，还有一些中国学者完成了很认真的历史研究（刘小萌等），另一方面自从70年代末，一种集体记忆已经在民间开始形成，先是在文学作品和回忆录里，后来也出现了一些对知青一代的比较有反思性的文本。但是，到现在还有很多引起争议而且有待大家再反思的问题，比方说怎么评价运动的动机和功过，以什么面目让这个运动留在社会的集体记忆里，怎么评价知青这一代等。

在这里只能简单地提一些我认为比较值得议论的三个问题。

#### ◇ 引起争议的三个问题

##### 1，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

文革前和文革后的上山下乡运动在知青，知青父母，农民和地方干部之中引起了很深的的不同。虽然如此，这个政策还是持续到1980年。看起来，领导人推行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是比较重要的。有些动机是公开的，而且不断地被宣传，有些很少被提级，甚至还有一些连领导人也没有充分意识到的。

这些不同的动机可分为四类：

- 意识形态动机（改造青年思想，消灭社会差别）
- 政治动机（恢复秩序，强化毛的权威）
- 积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开发农村和边疆地区）
- 消极的社会经济动机（减缓城市发展和城市就业）。

很多学者认为最主要而且是有决定性的动机是城市就业问题。其他的只是次要的，甚至是假的（只有宣传作用的）动机。我的看法则不一样。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分析从50年代到1980年下乡政策的演变，我觉得应该分清两个不同的逻辑：一个是管家人（负责实际工作领导人）的逻辑，另一个就是最高领导人，唯一意识形态的提供者（毛泽东）的逻辑。而在不同的时期，这两个逻辑的轻重就不同。文革前，特别是大跃进引起的经济灾难以后，主要的动机就是减轻城市负担。但是68年后，最主要的动机是属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假如减少城市劳动力和城市人口是主要动机，怎么解释从1968年到1977年当知青大规模地下放农村的时候，大约同样数字的农民在城市里得到了永久性的雇佣？当时政府靠户口制度可以制止这次城乡人口大交流。文革开始的时候，毛强调要政治挂帅。从1960年开始，他一直发出警告，中国有可能“变色”，变成苏联那样的修正主义国家。他特别担心中国青年一代可能忘记老一辈坚持的“无产阶级革命观”。而且他认为学校教育是危险的，年轻“知识份子”要想挽救自己，就要像他年轻的时候一样与工农兵打成一片。我们不要忘记毛泽东的权力是靠意识形态和政治，不是靠他对经济学的掌握。他越老就越担心他将来的历史地位。对他来说，改造新一代人是个重要的意图，把自己的伟大蓝图强加于中国的现实上是无比重要的。所以评价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与对毛政权的理解是有密切联系的。我认为不要用西方的或中国现在的经济理

性主义来理解毛泽东的中国。

当然，毛也需要管家人（及一般的官员）来执行下乡政策。他们双方是互相需要的。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的时候，为了给下乡运动新的活力，双方妥协。但是到毛泽东去世为止，这种妥协一直是很脆弱的，经常发生动摇。在激进派和务实派之间，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冲突不断地出现。1978年底，当管家人和他们的经济逻辑正在取得胜利的时候，在新的知青工作会议上领导层达成了新的共识：下乡政策终将取消，但为了避免给城市带来就业问题，这项工作还要持续“若干年”，而且一部分在乡知青要一辈子留在那儿。但是，实际上下乡运动很快就结束，而且一场“回城风”很快就把知青带回城市里了。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突然终结也有不同的看法。

## 2， 社会抵制的效果

下乡政策很快就引起了社会，特别是知青自己的不满情绪及各种形式的抵制。但是1978年以前，这种抵制只能是消极的，因为社会和政治控制体制不允许进行任何反抗。只有一个例外，就是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大部分知青趁机回城闹革命。很多知青自己成立红卫兵组织，要求批准他们回城，但是1967年他们受到很大的压力后，就不得不回乡下去。

1978年底，全国工作会议还未结束，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农场知青发起了一场运动，他们以情愿书，游行，罢工及派代表到北京要求当局批准他们回城。全国其他地方的知青也公开表示要回城，有些地区的知青未经许可就一波一波地挤进火车打道回家。当时知青将这次“回城风”称为“胜利大逃亡”。除了个别情况（主要是与农民结婚的知青和文革前下放到新疆的上海知青），政府终于同意他们回城。美国学者 Stanley Rosen 在1981年出版有关广州知青在文革中的角色的书里，认为两个时期（1966—1968和1978—1979）知青的呼吁与反抗很相似。我认为虽然有些形式相同，但是两个时期的情况和抵抗的效果基本上是相反的。文革的时候，政治环境对要求回城的知青非常不利。因为当时的极端理想主义，他们的要求很容易被扣上“自私”的帽子。因为他们在城市人口中的比例还不很大，而且大多数人都是“出身不好”的，所以他们没法反抗当权者的意志。反而，1978—1979年的时候，政治环境对知青很有利：为了取得新的合法性，中共改革派开始批评和改正文革很多政策。知青就可以自称为文革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在运动发动的十年以后，对这个政策有抵制情绪的人，主要是知青和他们的家人，已经占城市人口相当大的比例（当时，只是在乡和已经回城的知青已占城市人口大约15%的比例）。1979年，中国政府在宣传和组织工作上花了很大的力量来执行前面提过的工作会议的决定。他们知道就业情况特别紧张，因为1962—1964年出生的城市人口（中国历史上最庞大的出生高潮）正在达到就业年龄。但是当局没法抵抗回城的潮流。从1978年底到1980年初，大约600万知青回城（这个高潮比十年前，即1968年底到1970年初大约500万知青下乡的那一个高潮还要巨大）。

上山下乡运动的突然崩溃有几个历史意义。第一，它表明在客观历史上，就业人口的变动没有决定这个运动的命运。反而，就业情况最紧张的时候，是大多数知青回城和下放政策停顿的时候。如果我们把每年下乡知青的数目与达到就业年龄的城市人口比较起来，就会得到同样的结论。

第二，如前面已经说了，大转变的一年不是1976年（所谓“十年文革”的最后一年），而是1978年。那一年有关上山下乡政策的辩论和年底开始的“胜利大逃亡”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虽然政治制度没有基本的变化，但是从1978年开始，国家体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不可忽略的演变。领导人已放弃了制造“新人”和迈向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他们把“四个现代化”放在首位，所以他们不得不承认社会阶层有一些基本利益，也需要一定的自主空间

来发挥其经济活力。虽然距公民社会的形成还是很远，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发动一场1968年那样的不顾社会相当一部分人的基本利益的运动，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反而知识青年的积极抵抗可以强迫政府让步。这次社会抵抗的胜利反映着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所以可以说1970年代末知青要求回城的运动是最近开始发展的维权运动的先驱。

### 3，知青一代是怎么样的一代？

按原来发动上山下乡运动的目标来看，除了1968年解散红卫兵组织恢复秩序的短期目标达到了以外，这个运动在经济、意识形态与政治方面基本上是失败的。如果我们研究这个运动的一个特别的成果：知青那一代，我们也发现毛完全失败了。他的政策确是对整整一代人有了深刻的影响，以至他们具有同属一代人的强烈归属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像陈佩华那样称他们为“毛的孩子们”。但毛肯定不会承认这些人是他的孩子，因为这一代没有被改造成“社会主义新型农民”，也没有被改造成无私地为共产主义理想，或者是为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奋斗的“革命接班人”。反而，在整个七十年代的过程中，这一代对毛的思想和政策有了比较深刻的反省，甚至开始持反叛的态度。毛还在的时候，广州的李一哲大字报和1974年重阳节白云山事件与北京天安门四五运动都是很明显的例子。毛死了以后，在改革派和凡是派的斗争中，这一代就支持了反对文革和毛泽东“既定政策”的改革派。可以提很多例子来证明红卫兵及知青这一代与代表“修正主义”的领导人的“战略联盟”：“民主墙”的活动分子（多数属于这代人）在关键时刻，即1978年底的三中全会时，对改革派的帮助；年轻专家参加拟订与毛一向的意志背道而驰的农村改革（主要是包产到户政策）；还有知青作家参加“伤痕文学”，等等。这一代不只是在政治斗争中背叛了毛派，而且在思想价值方面叛离和超越了毛泽东。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的民主运动及年轻文学家和艺术家的非正统创作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可以说这一代的自身经历对他们世界观的影响与毛最初的愿望大相径庭。李银河，属于这一代的一位社会学家，很清楚地概括了这一点。她说：“当初让我们到‘广阔天地’里去接受‘再教育’的人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这个残酷决定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造就了一群什么样的人。他的理想主义造就了我们的现实主义，他的教条主义造就了我们的自由思想，他的愚民政策造就了我们的独立思考。”

从七十年代末到1989年的民主运动，这一代的自由思想和独立思考能力有了丰富的表现。虽然六四镇压和邓小平南巡以后，这种精神受到了很重的打击，但是它没有消失。最近几年，它的一个有意义的表现就是这一代的一部分人为了建设和保存他们一代人的真实记忆而奋斗。虽然上山下乡运动对当局来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革那么敏感，但这个题目还是受到监督和控制。虽然允许出版了一些半官方的书和文章，官方不鼓励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这个运动的记忆只能是民间的。这一代人都同意要记忆他们的经历，但是在怎么记忆的问题上，他们有不同的看法。大致上，有两种不同甚至是对立的记忆：一个怀旧的记忆和一个批评的记忆。六四镇压以后，官方批准（有时甚至是鼓励）了一些前知青举办有关上山下乡运动的展览，出版回忆录和照片集，开“知青餐厅”或组织前知青集体旅行到当时接待他们的农村。这场九十年代的怀旧潮一方面是有点儿荒谬的，因为它是对“蹉跎岁月”的怀念（当时大部分知青尽量想办法回城），但另一方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四五十岁的人怀念自己的青春是个再普通不过的现象。年轻的时候经历过比较刺激和特殊的历史事件的人会有更加强烈的怀旧情绪。“蹉跎的激情岁月”（丁帆一篇文章的题目）能概括这一代对自己青春的自相矛盾的情感。一方面，因九十年代的经济社会变化特别地快，似乎把他们年轻时候的世界和他们现在的知识和才能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里，所以公开地怀念自己的青春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肯定自身价值的手段。但是这种可以理解的怀念，对那些不肯掩盖“文革”黑暗面的人，显得太不真实也太容易被官方歪曲历史的宣传所利用。他们批评怀旧派的口号：“青春无悔”。双方就关于这个口号开启了激烈辩论。反对者提倡这一代不但要反省也要“忏悔”，甚至有一个属于这一代的人把“老三届”称为“丑陋的老三届”。



事实上，这个问题很复杂。第一，老三届（即这一代的核心）在年轻的时候，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先是红卫兵，后是知青。当红卫兵的时候，他们经常害别人（虽然很多红卫兵也受过害），但是当知青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受害者（虽然有不少知青为了达到回城或得到别的好处的目的，而不惜害别人）。当然，他们现在宁愿回忆受苦的知青时代也不想回忆害人的红卫兵岁月。但是我们应该承认相对来说，知青没有做太多“丑陋”的事情，哪怕只是因为没有机会做。

第二个问题是文革和上山下乡运动的责任主要是谁的。鉴于毛泽东利用群众运动来把自己意志强加于整个中国人民的统治方法，人们很难逃避参加毛和其他领袖为他们写好了的戏剧，也很难选择自己的角色：受害者、刽子手或者帮凶；而且还要经常交换角色。在这样的情况下，后来需要忏悔的人很多。但是有罪的人越多，他们要分担的罪责相对来说就越轻。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人对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实在很小。我采访的一位知青告诉我，她的生产大队里的知青曾经抗拒当局把他们派到另一个地区的计画，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原来插队的地方而是因为他们受不了被当作一群鸭子的感觉。当时的中国人真是被领袖当作一群鸭子。这个情况淡化了做真正的人的责任感和自尊意识。从这个意义上，“丑陋的老三届”这个称呼就显得太刻苦和太绝对。反而，“丑陋的毛泽东”比较适合。我的意思不是说现在的人不需要忏悔自己当时的盲从和帮凶的行为，而只是想对历史责任有个比较公平的判断。

对“毛的孩子们”，“失落的一代”这个称呼似乎比较合适，因为他们失去了不少东西。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的那一代人一样，他们的幻想破灭了，他们不能再尊重孩提时代学到的价值观，而中国的“失落的一代”也失去了在最佳年龄接受教育的机会（也有一部分人失去了结婚成家的机会），所以又被称为“耽误了一代”。他们也可以说是“被牺牲的一代”，因为他们当时的“偶像”为了自己的权力欲和过时的理念，将他们当作祭品送上了圣坛。但是这个残酷的经历让这一代人受到启发。至少他们现在不肯再失去他们经历的记忆和对这段历史反省的权利。这件事不能再“耽误”了。假如又失去了记忆，这一代的命运实在太残酷了。

□ 原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香港，田园书屋，2007年  
~~~~~

【解密档案】

给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信

• 白智清 •

（编者按：白智清，男，1945年出生，四川成都市人。1965年从成都一机校毕业，分配到重庆钢铁公司机修厂当技术员。1974年，白智清以“心赤客”为笔名，发出数封鞭挞“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信件，被公安部列为“心赤客反革命案件”而受到处理追查。1976年2月7日夜，白智清还以“祖国忠诚的儿子，重钢职工白智清”的真实姓名，写下题为《我爱我的祖国》的大字报。1976年6月32日，白智清被捕，被关押在成都的一所监狱。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白智清在1978年7月31日被释放出狱。）

李德生同志：

图穷匕现，当前斗争发展到此时此刻，我想你是非常明白的了，是要周总理，还是要王洪文，江皇后……

是助纣为虐，与虎谋皮，苟且偷安，还是大义凛然，当机立断，为民讨贼，对您将是一场

残酷的考验！

仔细想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前车之鉴，后车之覆，此时此刻切勿执迷不悟!!!

拯救民族和国家的重担，已经落到您的身上，当断不断，反遭其乱，该决不决，自寻其灭……
如果到了“后党”形成，大权旁落……最后到了国破家亡的地步便悔之晚矣……

心赤客

一九七四年

江皇后：

春风吹得百花盛开，寒风吹得万物萧索，你的屁疯又发了，又把大好河山整成这个样子。

但凡害国家，误民族，远远超过杨贵妃、赵飞燕。不管你头上戴了多少顶堂皇的桂冠，也不管你现在是如何的不可一世，末日就在眼前。人民，全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将活活处死你这个民族的罪人。那无情的历史，将永远把你和那一群狗打入十九层地狱。

不要再卖弄风骚了吧，乌鸦不管怎样用孔雀的羽毛来打扮自己，乌鸦仍旧是乌鸦，永远不可能成为孔雀。

爱国者

心赤客

一九七四年

敬爱的总理：

我含着激动的泪花，给您写封信来。我深知讲这几句人人意中所有的话，代价是我的生命，但是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我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

五十年代初新中国犹如东升的旭日，蒸蒸日上，欣欣向荣，建设突飞猛进，生活日新月异，最叫人激动的是您的政府工作报告。人民回首成功的过去，展望着辉灿的未来，那个时候，生产上升的指数，大大超过人口增长的指数，有谁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又有谁为自己的饭碗发愁。那个时候青年人怀着伟大的理想，老年人越活越年青……社会上有几个扒手，有几个流氓，有几个小偷……为什么现在反而成了这个样子。……敬爱的总理，人民深深知道您不会不痛心，更不会忘了37年的教训，民族的奇耻大辱……在您和一切爱国的老干部的努力之下，国家又在复苏……广大的人民又有了希望……可是皇帝娘娘的×疯发了，又整成这个样子……

总理啊！总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列强的瓜分，民族的屈辱又会重新出现，在中华民族的面前，您难道愿做一个民族的罪人么？难道您真的相信在帝国主义的实力面前，“思想”会比鸦片战争时期的“天朝圣威”有用么？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要用物质的力量来打倒，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千古如是。这些人锋芒毕露，矛头所向之处，总理您应当是非常明白。

现在而今，它们还没有这样大的力量，当前只能有短暂的平衡，到手足具削之时，便悔之晚矣……

敬爱的总理，不要以为它们有多大的力量，您应该清楚，党内党外，军内军外，上上下下就连造反派中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恨不能食江皇后之肉，喝王洪文之血……人民在爱国的一边。……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敬爱的总理，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民族的昌盛，切勿手软啊！

当断不断，反招其乱！该决不决，自寻其灭！

是决定的时候了！！

心赤客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六日

敬爱的叶帅：

我们深深知道，您非常爱国家，非常爱人民，难道您未看见在那群恶狗的践踏下，中国落到了国亡无日的田地？他们把矛头对准总理和所有的老干部，稍有一点爱国心的人，有哪一个不想吃这群恶狗的肉，喝这群恶狗的血啊！军内军外，党内党外，上上下下，人们的眼睛都快冒火了。

叶帅，敬爱的叶帅，为了拯救国家，拯救民族，因势利导，担负起这个沉重又伟大的担子吧，我想第一步，告诉军队，没有总理、你、小平的名字，不管谁都调不动!!!我们相信军队是听你们话的。第二步，对林彪系统的将士，只能安抚，不能压服，以免搞出问题，不要逼上梁山。我想他们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恨这群狗和爱国的，还是听你们的话的。

叶帅，农夫惜蛇被蛇咬，放虎归山虎伤人。是干的时候了。

为了祖国的富强
敬礼！

心赤客敬上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

敬爱的邓副总理：

作为您的同乡和一个中国人，我给您抄来几句可能您早已热知的蜀相“诸葛亮”的语录。现抄录如下：

赏罚之政，谓赏善罚恶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

赏不可虚施，罚不可妄加，虚施则劳臣怨，妄罚则直士恨。

赏赐不避怨仇……诛罚不避亲戚，赏罚不正，则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赏罚第十）

纳言之政，谓之谏诤，所以采众之下谋也。

夫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敢进某谋，而邪臣专其政，此亡国之害也。

是以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矣。（纳言第四）

喜怒之政，谓不应喜无喜之物，怒不应怒无怒之物。怒不犯无罪之人，喜不从可戮之士。（喜怒第十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

将写即帝室之胄，议义著于四海……百姓敢不箪壶浆以迎将王者乎？

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隆中对）

好了，就抄录于此吧！

敬爱的邓副总理，您有何感触呢？思古抚今，能不肝胆俱裂么？国家落到这步田地。难道不是“赏罚不明，忠臣死于非命，邪臣起于非功”么！难道不是不纳忠言，忠臣不敢进其谏，而邪臣专其政么？

难道不是喜怒无常，怒犯无罪之人，喜从可戮之士吗？

难道不是，亲小人，远贤臣，使国家所以倾颓么！

邓副总理，希望您别忘了您是炎黄的子孙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你是堂堂副总理。

难道您忘了，您们远离故土，出国寻救国救民的真理时，难道您和您的战友，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昌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时候！

我想对拿破仑您一定不会陌生的。拿破仑第一次退位后，在1815年3月1日开始的第二次政变。从厄尔巴岛发动时只有为数极少的一千人，再返巴黎，不用一枪一弹，便推翻了掌握整个法国和几十万军队的波旁王朝。

这并非神话，结论只有一个，他代表着法国的民族的利益……得人心者得天下。

现在而今，全国人民的心，全军队的心，全民族的心，又向着谁？

事实，严酷的事实教育了人民，是谁，使锦绣河山赤地万里，饿尸遍地，是谁，带着人家死里逃生，渡过非常时期；是谁，使国家蒸蒸日上，欣欣向荣；是谁又使国家落到这步田地。谁是人民的儿子，谁又是民族的罪人，人民都看清楚了。

当你任总长的消息传达后，全国，特别是军队，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多少人感动得热泪长流。

而对另一个，根本就没有什么声响，有的是仰天叹息。

不甘心民族重遭奴役，国家重受破碎的中国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您和您们身上。

邓总长，北有苏修，南有印度，你何以对敌。一旦战争爆发，唉！

自强才是根基，拉东打西，哪是长久之计。

庆父不死，鲁难不已。要想自强，不除四贼，终归妄想。

将军仁义著于四悔……，我们深信，你能拯救中国，救民族，也救自己。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为了祖国和中华民族，敬礼！

心赤客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日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